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救国会史料集/周天度,孙彩霞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7

ISBN 7-80109-950-8

I. 救... II. ①周...②孙... III.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5) — 史料
IV. K264.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8287 号

救国会史料集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2(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787×960 毫米 1/16

字 数:1450 千字

印 张:73.125

版 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0.00 元

救国会史略*（代前言）

周天度

救国会的全称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它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上海为中心组织起来的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开会正式成立。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全国解放后，鉴于救国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1949年在北京开会宣告结束。救国会在它存在的14年中，积极地参加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胜利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左翼政派。

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有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等人。

一、救国会的成立及其主张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以上海为中心发展和组织起来的。在全救会成立前半年内，上海爱国运动已经蓬勃开展，并且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它的一些领导者，就是全救会的负责人。因此，要说明全救会的成立，首先要从上海救国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叙述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独占殖民地的新阶段。“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南京政府决定诉诸国联，国联未采取制裁措施，东北三省迅速沦亡。1935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越过长城，踏进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吞并全中国。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要求抗日的人民，对外

*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这次收入本书作为“代前言”，编者作了若干新的史实补充和文字上的改动，删去了一些左的词句和某些议论，基本观点内容及架构一仍如旧。

妥协屈服，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随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亲日派汉奸在华北发动所谓“五省自治运动”，河北东部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

危急局势，引起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关注，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在1935年这一年中，上海文化界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围绕日本侵华，举行了各式各样的时事座谈会、报告会和读书会，在上层，则有叙餐会的形式，探求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方策。爱国知识分子要求抗日救亡的呼声，开始涌现。是年5月，《新生》周刊登载了一篇《闲话皇帝》的短文，日本侵略者认为侮辱了天皇，横加干涉，国民党政府即将《新生》周刊主编、爱国人士杜重远判罪入狱。事件发生后，在全国特别是上海文化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愤慨和不满。邹韬奋在美国获悉杜重远含冤入狱，愤怒和悲痛“不能自抑”^①，加速了他的归程。8月27日，他由美国赶回上海，下船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眼眶的泪水”奔向漕河泾监狱去探望被囚禁的战友。《新生》案件宣判的第五日，沈钧儒写了下面一首感怀诗：“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寻。”^②严酷的事实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是招致国家民族灾难的根源，只有人民大众团结一致，奋起自救，并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作必要的斗争，才能实现民族解放。一个新的爱国运动的掀起，不可避免。

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党的宣言，指明了方向，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出版，首先举起了鲜明的抗日救国旗帜。写的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一文认定：劳苦大众的生路，民族解放唯一可能的途径，只有“冲破重围，用大众的力量……作自救的英勇奋斗！”邹韬奋大声疾呼：“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华北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整个问题的一个部分”；要求“动员全民族大众的集体斗争的力量，共同起来为着整个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战”。^③《大众生活》随即成为上海及全国救亡运动最主要的宣传阵地。

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

① 邹韬奋：《笔谈》，《生活星期刊》第15号，1936年9月30日。

② 沈钧儒：《寥寥集》第3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

③ 邹韬奋：《华北问题》，《大众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11月30日。

俊瑞等二百八十余人联名发表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进一步表达了他们对国事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说：“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①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等八项主张。宣言初稿提出讨论时，北平学生“一二·九”大示威的消息传到上海，给文化界救国运动的发起者们以很大鼓舞，因此临时在宣言上添上了“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的句子。

以《大众生活》的出版和文化界救国宣言的发表为序幕，加上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有力推动，上海各界民众救国运动以燎原之势，迅猛展开。

12月19日至20日，上海复旦等大中学校学生八千余人，冒着刺骨的寒风，连夜游行，并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维持领土主权之完整，出兵收复失地，保护救国运动，保障言论集会自由。游行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大家起来救国”等口号。

12月21日，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人发起的妇女救国会首先成立。当日，包括各大中学校的女学生、女工、律师、作家、医生、教育家等近千名妇女，为了支援学生爱国运动，在南京路举行示威游行。随后，妇女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妇女书》指出，华北事件是东北事件的后果，再不急起抵抗，不久又会变成华中、华南事件的原因；要求打破妇女只会烧饭抱孩子的错误理论，同爱国男子共同负起救国的重任。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有三百余人参加，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顾名、沈兹九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救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②文化界救国会在成立会上讨论名称时，沈钧儒鉴于《新生》事件的前例，提出不加“抗日”、“反日”字样，以避免日本政府的干涉和日本浪人的捣乱，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接着成立的是周新民、潘大逵、张定夫等发起的大学教授救国会。此外，上海复旦大学等一些大中学校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

随着爱国运动的热烈开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激进，章乃器写的《四年间的清算》一文，颇具代表性。文章以犀利的笔锋，大胆地清算了

① 《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21日。

② 《大众生活》第1卷第9期，1936年1月11日。

国民党当局四年来执行“先安内，后攘外”路线造成辱国害民的种种事实，并指出：倘使他们到今朝还要隐过饰非，为了保存自己的历史而不惜断送民族的历史，或者将错就错，甘为敌人的虎伥而不肯自拔，“那不但是误国，而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卖国了！这种人，只要中国民族的历史一天不断送，民众自然会起来诛伐他们的”。^①

团体分散，容易被国民党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因此，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及一些大中学学生救国会等团体发起，在1936年1月28日“一二·八”四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决定进一步扩大组织，筹备成立全国救国联合会。2月9日，沙千里领导的职业界救国会成立；2月23日，陶行知领导的国难教育社成立，有四百余人参加，均加入各界救国联合会。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为了扩大救国运动的宣传和影响，先后创办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并在3月31日和“三八”、“五九”、“五卅”等纪念日，举行几次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反日大示威，参加的男女群众万余人，“为‘一·二八’以来未有之壮举”^②；5月30日，各界六千人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五卅”，“壮烈的游行，唤醒了全上海民众”^③。上海救国运动得到宋庆龄、何香凝和冯玉祥的积极支持。

救国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只是一小部分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但不久以后，就有各阶层各党派的人参加。由于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遭到彻底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如胡乔木、周扬、钱亦石、胡愈之、钱俊瑞、王翰、柳湜、曹亮、周新民、邓洁、顾准、张执一、王新元、王纪华、徐雪寒等为了抗日救亡参加了各界救国会，成为其中的骨干。他们把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带了进去，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救国会的力量。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来到上海后，会见了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了关系。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事。从此，沈钧儒和救国会便同中国共产党有了正式组织上的联系。救国会成立后，上海几次大的群众示威游行的组织者，都是共产党员。救国会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民主运动的最好组织形式，对党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救国会是一个松懈的半公开的群众团体，入会没有什么限制，只要不是汉奸卖

① 《大众生活》第1卷第11期，1936年1月25日。

② 巴黎《救国时报》，1936年3月10日。

③ 《救亡情报》第5期，1936年6月7日。

国贼，主张抗日，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都可参加。所以，除共产党外，还有国民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员参加。大部分则是无党无派分子。由于是这样一群人的结合，因此除了抗日这个大目标相同外，在抗日的方法和其他问题上，则很难趋于一致。各党各派政治观点的分歧，常常在救国会内部反映出来。一个经常争论的问题，即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以王造时为代表的包括国社党、第三党在内的一小部分人主张反蒋抗日；以沈钧儒、章乃器为代表的大部分无党派成见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从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立场出发，同时考虑到国民党统治区具体情况，不主张一般地整个地反对国民党，笼统地提反蒋的口号，而只是反对它的不抵抗和内战政策。

上海救国运动的开展，在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上海文化界两次救国宣言在每期销数达二十万份的《大众生活》以及《读书生活》、《生活知识》等刊物上发表后，影响甚大。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等地的妇女界救国会和文化界救国会相继成立，并与上海“文救”和“妇救”取得联系。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侵略有增无已，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将各地的救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进一步推进抗日救国运动。同时，救国运动的发起者们认为，只有人民自己首先联合起来，才能促进国内各党派的联合。这一年3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曾把促进全教会的成立作为它的工作任务之一，随后派人前往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串联，物色邀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会和全教会成立会的代表。5月29日，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号召和领导下，加上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积极推动，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到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共七十余人，其中一些人就是前一天出席全国学联成立会的代表。他们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杜君慧、金奎光、吴耀宗、沈兹九、沙千里、钱亦石、钱俊瑞、胡子婴、潘大逵、高士其、曹亮、王新元、黄敬、李嘉宇、刘江陵、陆瑾、董毓华、刘清扬、曹孟君、孙晓村、狄超白、王枫、何伟、段君毅、何明理、吴祖贻、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石不烂、洪飙、方少逸、吴超炯、谭冬青、唐守愚、韩兆鹗（琢如）、徐范、李仲融、方铭等。^①会议听取了平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和南京、上海、厦门、香港等地救国会代表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

^① 参加全教会成立大会的人，无纪录可查，这个名单是根据访问得来的，仅供参考。邹韬奋去香港筹备办《生活日报》，李公朴则去了杭州参加史量才葬礼，陶行知去了华南，并准备去欧洲，故均未出席大会。

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作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陶行知、孙晓村、曹孟君、何伟、何思敬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

全救会的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灭亡全中国，中国人民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任何党派“如果放弃了当前的大敌，对敌人作无限止的让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用权威排除异己，用权术巩固政权，那结果反只有使人心离散，而自陷于覆亡”。国民党“中央已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的一掷”。^①

文件规定：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② 它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③ 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纲领的忠实执行，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纲领以及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为，并且声明：它同国民党当局的抗争，只“是一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④ 文件还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坚决反对任何当局压迫民众运动，摧残言论自由，等等。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署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对西南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给予人民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的自由；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⑤

救国会在那个屈辱的年代，不畏国民党的高压，以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并对国民党“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政策进行大胆批评与勇敢挑战，在国民党统治区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国内各方面的重大反响。

①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②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草案》，《救国言论集》第33页，全国各界联合救国会1937年5月印行。

③ 同①。

④ 同①。

⑤ 《生活知识》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5日。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救国会的主张。1936年8月10日，他在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诸先生的一封信中，对救国会的宣言与纲领，以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极大的同情与满意，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中国共产党愿意与救国会及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党派、组织和个人诚意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大多数通过的规章、纲领和决议，最后并表示“我们很荣幸的签字于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之后”！^①

毛泽东随后在另一封给章乃器等人的信中又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②

二、各地救国组织的建立与加强，救国运动的广泛开展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在各地设立分会和各种抗日救国组织，以推进救亡运动。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各地救国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海外华侨中也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将几个重要的与全救会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救国会组织情况，概略叙述如下：

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救国会是在秘密和艰苦环境中建立并进行活动的。孙晓村、曹孟君等出席全救会成立大会后，回到南京，积极活动，8月，成立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南救”），负责人除孙晓村、曹孟君外，还有晁文瀚、李庚、薛宁人、狄超白、王枫、千家驹等。“南救”的组织情况如下：妇女界救国会的成员主要是小学教师和小部分中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职业界妇女以及一些家庭妇女（其中多系冯玉祥部下家属）。文化界救国会发展了新文字研究会等团体以及文艺界中一些人士。学生救国会的主要队伍在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以及安徽中学等几个中学中，同时，在国民党的军事院校，如辋重兵学校、步工兵学校中，也发展了组织。职业界救国会的组织主要依靠几个工人夜校和上海介绍的关系来发展的。此外，通过王昆仑、许家驹、孙晓村的关系，“南救”同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如张继、梁寒操等有一定的联系，其中最突出的是冯玉祥、李德全对“南救”的活动十分关心。冯常常通过孙晓村、千家驹等给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195—205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他讲学的机会，把一些重要消息告诉“南救”，并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作出分析。“南救”成立后，不能用本身的名义进行公开活动，曾以“绥远抗日后援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南救”与全救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基本上每周由王昆仑、孙晓村去上海一次，汇报国民党政府的内情，带回全救会的文件，有时还带回中共的文件^①，它实际上是全救会的一个分会。

全救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是全救会在华南的一个分支机构，总部设于香港。“南总”设理事会，由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以上三人任常务理事）、陈此生、陈希周、梅龚彬等人组成，李章达负总责，何思敬任宣传部长，吴涵真任组织部长。“南总”名义上负责指导广西、广东、福建等省救国运动，实际作用仅限于香港、广东两地。在“南总”指导下，9月18日，广东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同时，在东莞等县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原定年底召开华南救国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救会华南分会，后因上海救国领袖沈钧儒等被捕而中止。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初，西安一些中学学生和教职员组织了救国会，随后联合成西北抗日救国会。6月1日，西北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全救会成立大会后，又改名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西救”认定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就是它的宣言与纲领，将这两个文件翻印了二千多份，在群众及在野名流中散发，影响颇大，获得普遍的同情与支持。^②全救会鉴于西北抗日救亡工作已日见成效，建议“西救”“以救联名义相机公开活动”。^③“西救”从此逐步公开组织，扩大活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它与在筹建中的东北民众救亡会在西安联合召开了八千人的大会，并游行示威，向当地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抗日。11月下旬，全救会派张语还到西安参加“西救”工作。12月9日，“西救”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近万名学生和市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悲壮的游行队伍，使张学良深受感动，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西救”正式公开，并在西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了全救会的宣言与纲领。西安事变前，“西救”下属救亡团体有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23个，事变后有极大的发展，新成立的各行各业救国会如雨后春笋，抗日救亡运动如潮水般汹涌澎湃。“西救”的负责人有韩琢如（总务部）、杨明轩（交际部）、谢华（组织部）、张兆麟、徐彬如（宣传部）、宋黎、李祥九（民众武装部，西安事变后成

① 以上据孙晓村给作者写的关于南京救国会的回忆，见本书最后部分。

② 《救亡情报》第25期，1936年11月8日。

③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徐彬如的讲话》，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立）、田润芝（妇女部）。^①

上海是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全救会成立后，救国运动力量有进一步发展。茅盾是救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为推进爱国文艺作家在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联合一致，1936年6月7日，他和傅东华、夏丏尊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入会者百余人，发表宣言，声称：它是“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坚决拥护民族救国阵线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②鲁迅对救国会和文艺家协会倡导的统一战线救国运动，表示完全的赞同和支持。他说：“民族危机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③6月15日，他和巴金、黎烈文、张天翼等63人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指出：“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④。在此前后，上海工人救国会和学生救国会先后成立。职业界救国会到1936年10月，发展为七个干事会，共有会员一千三百多人，还联系了广大的职工和店员。“职救”的基层会员群众，主要是量才补习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的在校学生和蚁社社员，上海先施、永安几个大百货公司的店员大部分都参加了“职救”。“职救”是上海救亡运动中一支生力军，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一些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主要参加者都是“职救”的会员群众。

华侨爱国素不后人，在民族危机刺激和国内蓬勃发展的抗日救国运动影响下，亦纷起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救亡运动。

1936年初，旅居欧洲各国华侨先后组织了抗日救国会，但因没有“总的中心组织做指导，致救亡运动无密切关系，而呈散漫状态”。^⑤这一年8月，全救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和全国学联代表陆瑾因出席国际会议到达巴黎，竭力宣传华侨团结抗日，建立救国联合会，各国侨胞纷起响应。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召开，参加者有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华侨代表共四百余人。各代表发言一致表示奋起救国的决心，为华侨团结抗日救亡之“空前盛举”。^⑥陶行知、钱俊瑞

①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人徐彬如的讲话》，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1日。

②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③ 《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救亡情报》第4期，1936年5月30日。

④ 《作家》（月刊）第1卷第3号，1936年6月；《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1936年7月。

⑤ 《全欧侨胞奋起救国》，《救国时报》，1936年9月30日。

⑥ 《救国时报》，1936年10月5日。

和陆瑾在大会上发言，阐明全教会团结御侮的主张，介绍了国内救亡运动进行情况，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决定以该会为永久组织，定名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与全教会作亲密之联络。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对团结与推动华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起过重要作用。

此外，美国、暹罗（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国华侨，也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与全教会有联系。1936年11月22日，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通过决议，加入全教会，与祖国同胞团结一致，为抗日救亡而斗争。^①

鉴于国民党是一个统治着全国、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大党，但又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成为抗日的巨大阻力，因此，全教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揭露、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号召和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争取国民党内赞成抗日，同情和支持爱国运动的将领如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等，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督促它抗日。

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开幕，全教会发表宣言，并推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五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二中全会决议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并准许全教会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这些要求被国民党拒绝，请愿未获结果。沈钧儒、章乃器等在京招待新闻界，介绍全教会的主张和成立经过，要求新闻界积极支持，尽量登载救国运动消息，扩大救国宣传，推进抗日救亡运动。

9月初，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在南京举行外交谈判，日方提出华北五省自治，中日合作防共，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救国团体等亡华条件。9月18日，全教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针对这一新情况，提出严密组织，扩大救国阵线，加强吸收落后人物和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等上层分子的工作。^②接着，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阴谋，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外交谈判，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随即南京和上海的救国会会员与爱国市民，分别印就《为中日问题敬告同胞》和《为中日外交已到最后关头宣言》，发起广泛的签名请愿运动。10月12日，北平文化界徐炳昶、顾颉刚、钱玄同、钱玄同等六十余人，遥相呼应，发表对时局宣言，向国民党提出集中国力，在不丧权辱国的原则下，对日交涉；中日外交绝对公开；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等八项要求。10月18日，上海实业界教育界褚辅成、穆藕初、项康元、沈恩孚、黄炎培等215人也联合通电响应，说日本如有“轨

^① 《救国时报》，1937年1月20日。

^② 《全教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事报告》，《救亡情报》第22期，1936年10月18日。

外行动”，政府应“立以武力制止，遏未来之萌蘖，收已失之桑榆”。^①民族资产阶级从来是小心谨慎，“言不出矩，行不逾轨”的，但他们这种软弱的呼应至少表明，在爱国运动高潮的影响下，他们对国事也越来越关心了。由于人民的压力，国民党政府后来终于不得不采用拖延的办法，使对日谈判未获结果而停顿。

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曾致电表示悼念，唁电是发往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交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在救国会主持下，举行了三天群众性悼念仪式。10月22日，上海学生、工人、店员、作家、教授等各界人士六七千人为这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士送葬，一路上人们唱着悲壮的挽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呼喊“鲁迅先生不死！”“纪念鲁迅先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打倒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要努力民族解放斗争！”等口号。庄严壮烈的送葬队伍，像一股洪流，成为1936年下半年上海人民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行动，救国会的负责人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胡愈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都参加了送葬仪式，宋、沈等在鲁迅墓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最后章乃器、王造时等四人将一面由沈钧儒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黄绸旗，覆盖在灵柩上，下葬墓穴。

从8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伪蒙军侵犯绥东，随后发动了对绥远大规模的进攻，全教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发表宣言，呼吁绥远抗日。9月6日，救国会组织三百多个宣传队共约二千余人，走上街头，进行绥远募捐，并分送宣传品，扩大抗日宣传，当日接触群众数万人。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绥远运动。南京救国会在孙晓村、曹孟君等人领导下，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密切配合，冯玉祥也大力支持，推动国民党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张继、孙科、居正、覃振等发起绥远抗日运动。11月上旬，各界人士参加的绥远大会召开，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国民党左派如经亨颐、柳亚子和不少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到了会。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绥远后援会”。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国民党不准抗日救国的禁令，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高潮。会后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运动，一直深入到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以及医院的病房里，起了很大的影响，成为1932年以来南京规模最大的爱国运动。^②此外，华北、西北、华南地区，在当地救国会参与领导下，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绥远抗日运动。

11月中旬，全教会分别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要求出兵绥远，坚决抗日。给张学良的电报说：“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

① 《国讯》第144期，1936年10月21日。

② 以上据孙晓村给作者写的关于南京救国会的回忆。见本书最后部分。

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①

在援绥抗日运动热烈开展的同时，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数万人，因不堪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压榨，同时受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于11月上旬开始举行反日大罢工，提出增加工资，保护工人权益，反对日兵进厂压迫工人等12项条件。救国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援助，并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积极予以支持，罢工获得了胜利；但也随即在为救国领袖被捕的一个重要原因。

救国运动普遍深入到各阶层，不但为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拥护，而且得到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同情与支持，促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救国会以它鲜明的抗日爱国号召和艰苦努力精神，团结了广大群众，据估计，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救国会广泛宣传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党的主张成为群众的行动口号，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促进国内和平，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指出：“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②

三、国民党对救国运动的迫害和镇压，“七君子”事件； 救国无罪，人民的抗争

国民党不抗日，更不许人民抗日，因而对人民群众的任何抗日要求，它都予以严厉压制。救国会公然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相号召，要求建立一个容纳各党各派的统一的抗敌政权，同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相对抗，并以一个全国规模的组织出现，这自然被国民党视为大逆不道，因此，救国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诬陷和打击，从而展开了救国无罪和“救国有罪”的尖锐激烈斗争。

还在上海救国运动开展之初，国民党中宣部就发表一篇《告国人书》，对爱国运动横加指责和攻击，诬蔑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救亡团体“不曰反对中央，即曰颠覆政府”，是共产党的“阴谋”^③云云，蓄意制造“救国有罪”的舆论。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文章，针对国民党中宣部的诬蔑和恫吓，作了痛快淋漓的驳斥，指出：“中宣部对汉奸运动，则默加容许；对于救国运动，反严辞厉色，诬陷侮蔑，无所不用其极！”揶揄奸人捏造的事实，用“赤色汉奸”、“被赤色汉奸利用”等颠

① 《救亡情报》第27期，1936年11月22日。

② 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七次大会纪录，1946年4月12日，《近代史资料》总105号，2003年1月。

③ 《申报》，1936年2月12日。

倒黑白的呓语，来摧残救国运动，只能“自绝于人民”；坚决表示：救国运动的发起者和参加者，如果是中宣部一纸诬蔑文告所能吓唬得倒的人，他们“早就不敢在‘救国有罪’的环境之下，公然以救国相号召”^①。这些豪言壮语，表明抗日爱国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不妥协的。紧接着，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可以武力镇压抗日群众，取缔抗日救国运动，逮捕爱国分子。随后，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为名，查禁了《大众生活》等24种抗日刊物，并逮捕了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救国会11名负责人，邹韬奋被迫再次流亡海外。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国民党感到惊恐，压迫随之加剧。6月2日，沈钧儒、章乃器将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等文件，亲自送交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希望得到当局的认可，争取合法公开。吴铁城不仅不予承认，反而恶言相加，诬蔑全救会是“少数野心家”操纵的“反动的东西”^②，叫嚷要取消一切救亡团体，逮捕救国会的负责人，威逼沈钧儒、章乃器他们放弃救国立场，解散救国会。在国民党的淫威面前，救国会的领袖们毫不畏惧退缩，声称“忠于宣言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③宋庆龄写信表示完全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并签名于宣言和纲领之后，对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予以有力的回击。

正当全国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出于对内对外需要，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人，其公布所谓“罪名”是非法组织救国会，“托名救国，肆意造谣……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等^④。随后移解苏州，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史良单独押在司前街女看守所），成为当时有名的“七君子”之狱。接着，国民党又逮捕了全救会常委、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和曹孟君，查禁和没收了大批的救亡书刊。

现有史料证明，国民党这一镇压行动，完全是屈服于日本压力的结果。11月中旬，正当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在救国会的支持下，罢工进入高潮时，日本驻沪领事向国民党上海市当局提出消灭救国运动的三项要求：一、逮捕救国七领袖；二、解散救国会；三、取缔日商纱厂罢工。^⑤上海市当局也担心罢工扩大，形势恶化，局面不可收拾，要求公安局、工部局逮捕救国会负责人。^⑥18日上午，日商丰田纺织公司船津总务到上海市政府会见市长吴铁城和秘书长俞鸿钧，提出“取缔隐藏在罢工后

① 《大众生活》第1卷第15期，1936年2月22日。

② 《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③ 《宋庆龄致救国阵线领袖函》，《救亡情报》第6期，1936年6月14日。

④ 《中央日报》，1936年11月26日。

⑤ 《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

⑥ [日文]《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料（13），第32页。

面的赤色分子”。^① 同日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派领事寺崎见俞鸿钧，要求逮捕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寺崎随即向工部局提出了同样的要求。23日逮捕沈钧儒等七人的当天上午，俞鸿钧秘密通知寺崎，说明这次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逮捕是“不顾法律常规进行的，鉴于这种逮捕引起的社会的反映，希望不要在报上发表这一消息”。^② 下午若杉总领事会见吴铁城，吴谈了这次逮捕“所费的苦心”，表示“无论如何已尽了最大努力”，若杉则“表示感谢”。^③ 上引日文材料，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若杉给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密电，充分说明日本插手“七君子”事件的幕后活动情况。宋庆龄当时即敏锐地指出：“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④

上海市政府吴铁城、俞鸿钧之所以敢于逮捕爱国领袖，除了日本的压力外，还因为蒋介石南京政府在背后支持。23日，上海市公安局代表唐豹及律师詹纪凤在法院提审沈钧儒等人时均明白声称：“各被告均有共党嫌疑，奉中央密令拘捕。”“本案系奉南京密电令拘。”^⑤ 12月3日，蒋介石复电参与营救的冯玉祥指出，沈、章诸人“鼓吹人民阵线，摇惑人心，煽动罢工，扰乱秩序”，必须“依法惩处，不令放任”，“以遏乱萌，而正视听”。^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爱国领袖被捕，震动全国，国民党制造爱国有罪冤狱，妄图一巴掌把救国运动打下去，但人民不可侮，历史的洪流不可抗拒，抗日救亡运动是镇压不下去的，相反，却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把抗日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高峰。

11月24日和27日，全救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驳斥了横加于救国会的莫须有罪名，表示绝不放弃抗战救国立场，“救国会的人士，既以身许国，决不是逮捕等等足以阻遏其志的”。^⑦ 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运动，实现抗战。宋庆龄也发表声明，抗议对沈钧儒等七人的违法逮捕。

北平文化教育界李达、许寿裳、许德珩等107人，于24日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说沈等“热心救国，全国景仰”，要求“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⑧ 同一天，北

① [日文]《日中战争》(五)，日本现代史料(13)，第12页。

② 同上，第40页。

③ 同上。

④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⑤ 上海市公安局档案50-1-324。

⑥ 《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⑦ 《救亡情报》第28期，1936年11月29日。

⑧ 《救亡情报》第29期，1936年12月9日。

平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议决，自25日起罢课两日，并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诸领袖，开放民众救国运动。

30日，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中华》报发表沈钧儒等被捕消息，谴责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指出：“全国人民决不会为南京政府的爱国有罪政策所威胁，而坐视中国的灭亡，必须再接再厉，前仆后继来发展正在开展着的全国救亡运动。”同一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发表社论说：全救会“努力从事救国宣传与救国运动之组织，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对外，近来我海内外同胞的救国运动之进展，该会实具有巨大推动力与赞助之功”；号召海内外救国团体和同胞一致起来，反对南京政府“爱国有罪的暴政”，援救沈钧儒等七人，争取救国自由。

冯玉祥、于右任在南京发起征集十万人签名营救运动，“以表示民意所依归，而促南京最高当局之觉悟”^①。

“七君子”事件在海外华侨和国际人士间，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旅居欧洲、美国和东南亚各国华侨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杜威、罗素、孟禄等，都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恢复沈钧儒等的自由。

国民党摧残救国运动的暴行，引起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强烈不满。12月初，张学良只身前往洛阳会见正在部署“剿共”内战的蒋介石，央求他释放救国会的负责人，蒋介石拒不采纳。最后，张学良质问蒋介石，你“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介石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② 蒋介石如此顽固地坚持镇压爱国人士的立场，进一步迫使张、杨对蒋采取非常行动。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要求，通过张、杨“兵谏”的猛烈形式体现出来。当日，张、杨通电全国，斥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丧权辱国，背逆人心，残害爱国人士。“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③；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之一即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七君子”事件是“西安事变”的诱因之一。

沈钧儒等人被捕后，在狱中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抱着风雨同舟、患难共的决心，商定在被捕期间，采取一致的主张和行动：“六个人是一个人”，羁押，大家羁押；释放，大家释放；倘若国民党当局硬要胁迫他们作脱离救国会的表示，或将

① 《救国时报》，1936年12月10日。

② 《西安市民大会张主任委员演词》，《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

③ 《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他们分开羁押，他们就一致以绝食来抵抗。^① 沈钧儒等人在狱中的斗争是同外面的声援斗争声气相通，结合一起的。“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的第三项是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其他几项与救国会的主张复完全相同，而救国会又在西安事变前 20 天曾有电报给张学良，希望他火速坚决要求蒋介石援绥抗日，而且全救会与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关系密切，既然如此，全救会显然是“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因此迁怒于救国会领袖。“CC 首领”陈果夫、陈立夫竟要求枪毙“七君子”，以警告张、杨。事为冯玉祥所阻。冯玉祥说，杀了他们，救不了蒋介石，却堵死了与张、杨通气的余地，千万不可轻率从事。但二陈仍然坚持说，七人关在狱中，仍然天天有人去探望，经常发表谈话，混淆视听，扰乱人心，危害民国，不杀彼等不足以消除祸患。冯玉祥说，这也容易，禁止他们会客就是了。二陈无奈，只好表示同意。^② 从 12 月 14 日起，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顿时紧张起来，门口增加了宪兵和保安队，不仅朋友禁止见面，连家属也不许探望。沈钧儒等意识到形势的紧张，在混乱的局势下，意外的牺牲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共同表示：如果国民党当局把他们几个人绑出去枪毙，他们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一致从容就义，临刑时一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③

“西安事变”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反人民政策和对爱国人士进行镇压的暴行，痛恨达到了极点；停止内战，抗日民主，救国自由，都不能用通常发宣言、通电、谏诤和请愿游行等合法斗争方式达到，必须用特殊的手段强迫国民党当权者接受。“九·一八”以来人民群众抗日运动的浪潮，至“西安事变”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如不改弦更张，就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而将被人民的浪潮所淹没。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他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出现了和平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逐步形成，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7 年 2 月中旬，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由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开始改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基本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救国会所倡导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也已经出现。人们均以为沈钧儒等必可无罪释放，国民党政府一部分要人和司法部长王用宾、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等都表示，侦查期满后，取消羁押是不成问题的，不致提起公诉。但是，历史是曲折前进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国民党开始转变，并没有彻底转变，“也决不会在

① 《救亡情报》第 29 期，1936 年 12 月 9 日。

② 见本书最后部分，胡子婴：《关于救国会和“七君子”事件的一些回忆》。

③ 《韬奋文集》第 3 卷，第 132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年版。